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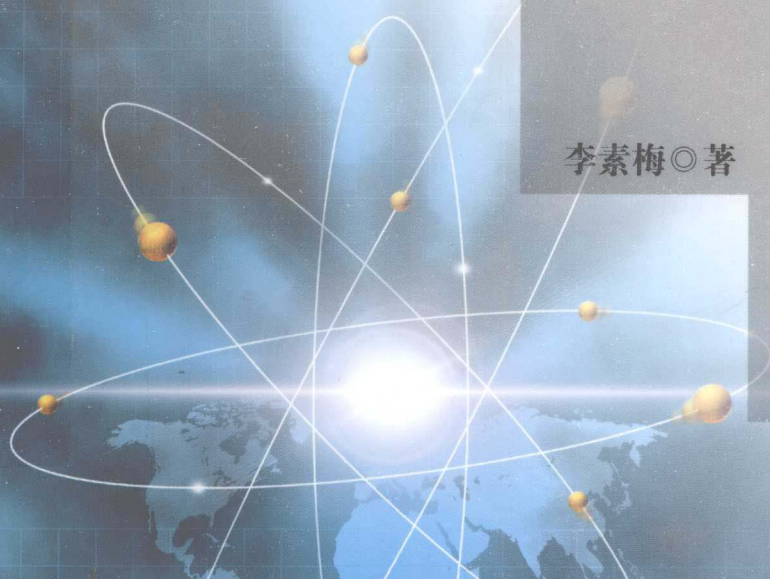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 第三辑

主编 ◇ 滕星

中国乡土教材的百年嬗变 及其文化功能考察

李素梅◎著

民族出版社



中国乡土教材的百年嬗变 及其文化功能考察

李素梅 ◎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乡土教材的百年嬗变及其文化功能考察/李素梅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5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3辑)
ISBN 978-7-105-10812-1

I. 中… II. ①李… III. ①乡土教材—研究—中国
—近代②乡土教材—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G4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7238 号

策划编辑:虞 农

责任编辑:赵文娟

封面设计:海龙视觉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网 址:<http://www.mzcbs.com>

印 刷: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256 千字

印 张:9.5

定 价:24.00 元

ISBN 978-7-105-10812-1/G·1764 (汉 823)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010-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64224782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主编序言

一

人类学 (Anthropology) 是一门全面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它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类群体的文化传承与文化学习、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教育学作为专门研究如何培养人类下一代问题的一门学科,也肩负着传递知识、传播文化的基本功能。这样,人类学和教育学之间就有了天然的脐带,教育人类学也由此成为二者之间有机联系的一座桥梁。

教育人类学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or 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 是由人类学与教育学相互交叉并通过科际整合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其核心研究领域是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教育,包括少数民族教育、乡村教育、移民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教育人类学吸收了包括哲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

国外教育人类学学科形成于 20 世纪中期,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以欧洲德国、奥地利等国为代表的哲学教育人类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两大流派。在文化教育人类学

流派中，又可以划分为主要由人类学家组成的教育人类学理论学派和以教育学家组成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学派。

欧洲哲学教育人类学学派主要注重于从人的本质、教育的本质、人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出发，从哲学的高度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中的教育人类学学派，继承了英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框架、概念与田野调查方法，并用其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学派则从英美文化人类学那里继承了“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并将其与美国的土特产——美国社会民族理论相结合来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其最初目标是为了捍卫以少数民族为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其长远目标是想通过教育改革构建一个不分族群、社会阶层、性别、年龄、身体与智力差异的、乌托邦式的国家与全球多元文化社会。文化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少数民族教育（包括移民教育和土著教育等）和多元文化教育等方面。

教育人类学在国外已有长足的发展，其学科地位早已确立，并对许多国家的教育改革、教育政策、教育规划、教育咨询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人类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国际上对全球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样性、文化差异与机会均等、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国家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关系的讨论；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来临，人们对教育与社会弱势群体倍加关注，教育人类学也随之成为社会与学术界瞩目的一门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

二

中国大陆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研究起步较晚，肇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当时研究的重点是异文化和跨

文化教育。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大陆才开始系统引介西方教育人类学的学科知识，传播教育人类学的基本思想和理论方法。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教育人类学获得了初步发展，不少学者开始尝试结合西方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本土的教育问题或试图建构本土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并对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大陆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的研究一直被冠以“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简称“民族教育研究”，其学科则被称为“民族教育学”，鲜有称为“教育人类学研究”或“教育人类学”的，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首先，这是由于人类学这门学科作为西方的舶来品，在 20 世纪初中期被引入中国时，产生的名称概念上的不统一，以及后来人类学在中国发展历史的影响。20 世纪初中期，人类学在英美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体系；在欧洲大陆的德国和苏联则将人类学称为民族学。当时的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赴德国进修民族学，并将民族学这一学科概念首先引入中国，尽管后来的人类学家吴文藻及其学生费孝通、林耀华等人先后将英美的人类学这一学科概念引入中国。但是，由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大学院系调整、民族识别工作、少数民族研究，以及西方英美人类学被错划为“伪科学”，而苏联的民族学则占据着统治地位等历史的原因，使大陆地区人类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只能仅以民族学替代文化人类学这一学科概念。当前，在西方的人类学体系中，民族学基本上作为社会文化人类学下的一门分支学科。而目前在中国的学科分类上，民族学和社会学都被划分在法学门类下，但人类学却被划分在社会学门类下。同一门学科被人为地划分在截然不同的学科门类中，造成了人们在学科概念上的混淆。

其次，早期大陆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主要以少数民族教育为其研究对象，很少以教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扩大关注主体民族——汉族的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故一直以“少数民族教

育”、“民族教育”和“民族教育学”加以称谓。

再次，由于该学科领域的许多研究人员对国外教育人类学学科的历史与发展，以及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并不十分了解，导致他们对教育人类学与民族教育学学科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十分清晰。当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并带有争论性的学术问题，在此不拟展开讨论。

20多年来，中国大陆地区教育人类学发展取得的重要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翻译引介了一批西方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和著作，传播了教育人类学的基本思想和重要理念。

二是从理论上对这一学科进行深入探讨，试图结合国情研究大陆地区教育的发展问题或试图构建教育人类学的本土理论体系。

三是采用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关注异文化教育现象，提倡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寻求跨文化的了解和对话，特别是为研究民族问题和民族教育提供借鉴。

四是从人类学的视角切入，解读汉族的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探讨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教育的文化功能等，在一个更广阔的人文背景下探讨大陆地区的教育问题。

五是积极开展教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出现了一批具有本土意义的教育人类学民族志作品。

六是在一些师范大学和民族院校陆续建立了相应的民族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学科科研机构，开设教育人类学课程，教育人类学人才培养模式逐步完善，学术科研队伍日益壮大。

七是在吸收西方教育人类学学科素养的基础上，进行本土理论建构，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人类学理论。

八是以教育人类学研究方法为基础的多学科合作研究课题成果初见端倪，积累了一定的教育人类学本土研究经验以及与国际组织合作开展研究的经验。

近年来，中国大陆地区教育人类学出现了注重学科建设，注重在本土经验基础上探讨全球性议题，更加关注现实问题的解决的新气象。目前，大陆地区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已走完学科萌芽阶段，由非学术化阶段开始步入初步学术化阶段。

三

在新世纪，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教育人类学，2001—2002年，民族出版社推出了由本人主编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一辑。这是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方面的第一套丛书。其第一辑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教育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是一套开放性的学术丛书，它肩负着两个主要任务：一是系统介绍与评价国外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二是在批判性继承国外教育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积累与展示中国本土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个案研究的最新和重大研究成果。它提倡走出书斋，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去研究当今中国的学校正规教育与社区、家庭的非正规教育，特别关注中国社会少数民族、妇女、残疾人和低社会阶层等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倡导书斋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风；推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与理论创新的精神。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一辑共5部著作，分别为：《西部开发与教育发展博士论坛》（滕星、胡鞍钢主编，2001）、《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与教育——理论、政策与实践》（滕星、王军主编，2002）、《族群、文化与教育》（滕星著，2002）、《文化遗产与教育选择——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人类学透视》（王军著，2002）、《文化环境与双语教育——景颇族个案研究》（董艳著，2002）。这5本著作的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极大

地推动了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和中国西部民族地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2005年,由本人担任主任的中央民族大学国家“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获准成立,这是国内“985工程”高校中首个以建设教育人类学学科为主要目标的研究机构。该中心力图在“985工程”的实施推动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体系和教育人类学学科体系。

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的大力推动下,2008—2009年,民族出版社继续推出了由本人主编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二辑共10部著作,分别为:《多元文化与现代性关系之研究——教育人类学的视野与田野工作》(钱民辉著)、《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本土经验与学科建构》(滕星著)、《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教育研究》(滕星、张俊豪主编)、《多元文化教育——全球多元文化社会的政策与实践》(滕星主编)、《教育的人类学视野——中国民族教育的田野个案研究》(滕星、张俊豪主编)、《多元文化社会的女童教育——中国少数民族女童教育导论》(滕星主编)、《教育与社会发展——贵州苗族社区个案研究》(罗慧燕著)、《教育与族群认同——贵州石门坎苗族的个案研究(1900—1949)》(张慧真著)、《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滕星、王铁志主编)、《全球视野:教育领域中的族群、种族与国民性》(N. Ken Shimahara等主编,滕星、马效义等译)。这些著作中既有教育人类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也有深入细致的田野个案研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研究水平以及国外相关研究的进展。

2005—2009年,在中央民族大学国家“985工程”的支持下,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实施了五个重点建设项目,分别为:

(一)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与初中地方性校

本课程建构（滕星教授主持）；

（二）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材开发的教育人类学田野调查与基础理论研究（滕星教授主持）；

（三）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在教育教学中应用状况及存在问题调查研究（滕星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王远新教授联合主持）；

（四）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政策、法规与管理体制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劳凯声教授主持）；

（五）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与效益研究（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王蓉教授主持）。

在这五个项目建设的直接推动下，我们精心挑选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作为《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三辑出版，这些作品分别是：

《经济文化类型与校本课程建构》（滕星、巴战龙、欧群慧等著）、《中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变革与义务教育发展：社会学透视——从税费改革到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郭建如著）、《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财政、资源配置与效益研究——基于云南、新疆、内蒙古等地贫困县的案例研究》（郭建如著）、《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应用研究》（滕星、王远新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研究论文选集》（滕星、王远新、海路主编）、《在田野中成长——教育人类学田野日志》（滕星主编）、《新创文字在文化变迁中的功能与意义阐释——以哈尼、傈僳和纳西族为例》（马效义著）、《土族、羌族语言及新创文字使用发展研究》（宝乐日著）、《多元文化整合教育视野中的“维汉”双语教育研究——新疆和田中小学双语教育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艾力·伊明著）、《民族学校教育中的文化适应研究——贵州石门坎苗族百年学校教育人类学个案考察》（张霜著）、《社会变迁中的壮文教育发展》（张苗苗著）、《中国乡土教材的百年嬗变及其文化功能考察》（李素梅著）、《学校教育·地方知识·现

代性——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巴战龙著)、《人类学视野中的教育研究》(滕星、海路主编)、《书斋与田野——滕星教育人类学访谈录》(滕星等著)、《多元文化视野中的民族院校》(张俊豪著)、《中国乡土教材应用调查研究》(滕星主编)、《无根的社区 悬置的学校——湖南大金村教育人类学考察》(李红婷著)、《文化变迁中的文化再制与教育选择——西双版纳傣族和尚生的个案研究》(罗吉华著)、《云南省黎明市孟波镇中学多元文化教师民族志研究》(欧群慧著)。

我们相信,《教育人类学研究》系列丛书的出版,将在人类学与教育学学科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它必将进一步推动人类学与教育学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与整合,为人类学和教育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从而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做出贡献。

滕 星

2009年12月修订于中央民族大学独树斋

序

我国的文化源远流长，世人皆知。而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世界格局的变化，中西方文化的交锋在我国就从未停止过。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多元文化并存和国际化趋势不断加深，“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的要求和认识已经成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重要共识。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尊重自己的传统，重视自己的本土文化建设在我国显得尤为重要。

李素梅博士的这项研究就是在这种背景和认识之下完成的。本书是在她的博士论文《中国乡土教材的百年嬗变及其文化功能的考察》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这项成果倾注了作者太多的心血，蕴含了重要的文化内涵，具有明显的理论和现实价值。作者以极其认真和严谨的态度审视我国的传统文化，客观分析我国百年来乡土教材的嬗变及其文化功能。作者带着浓郁的乡土情感，研读经典，深入传统，追根寻源，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且具有百年发展历史而至今没有被系统研究过的乡土教材，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首次清楚地勾勒出了我国乡土教材百年发展过程中三大时期五个高峰期的发展脉络。根固则叶茂，源深则流长；强根展须而繁新，拓源纳流而创奇。作者没有在这一研究上驻足，进而从中国乡土教材百年嬗变轨迹中挖掘其文化功能，又在对我国乡土教材的百年历史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对

其文化功能进行了深入分析，这对完整了解和深入理解我国乡土教材的发展历史及其文化功能具有重要的理论建设意义，对进一步发展我国乡土教材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可以说本书是对这一研究盲区的一个探索，具有明显的创新性。

本研究是一项工作量很大的课题，既要考察乡土教材的百年历史，又要分析复杂的内容。为此，作者在研究方法上首先确定了指导研究的理论基础、相关学科视野、研究范式与方法。总体上以质性研究为范式，综合采用多种研究方法，以历史为研究视野，以现实为研究的落脚点，史现并重，使本书具有了明显的现实意义和理论建构意义。本书在澄清相关重要概念和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对我国乡土教材的百年嬗变进行了系统梳理，这在我国学界尚属首次；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理论，对我国百年乡土教材的文化功能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以图从深层次上揭示我国不同阶段乡土教材的文化功能，这一点上该研究具有明显的创新性。

还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作这项研究时已过不惑之年，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女的多重角色，加之身体的疾患，为其研究带来很大困难，但作者能以极大的毅力克服诸多困难，顶着压力，学有成，心有得，研有新，见有长，全力倾注，浇铸成此书稿，内容丰富，很有创见，值得一读，我也为之骄傲。

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要把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中极为重要的任务，这已经成为我们这一时代的旗帜。在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一体化的今天，应该清楚地看到人文文化必须多元化。只有多元化的人文文化，才能百花齐放，才有世界的文化繁荣与社会进步。我国乡土教材在百年的嬗变过程中始终发展和创造着极其丰富的传统文化，并通过学校教育这样专门宣传、训导、教育和培养的场合和机会，忠实地履行着继承和发展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责任，在培养下一代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文化功能。此书在发掘我国传统文

化功能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尝试。

当然，此书稿也并非十全十美，须知欲穷千里目，应更上一层楼。我和作者一样，衷心希望广大读者不吝拨冗指教，更希望作者在此基础上能够继续自己的研究，多出成果，出更好的成果！

谨为之序。

滕 星

2009年3月30日于中央民族大学

前 言

“乡土”一词总是给人以某种延绵的亲切感，尤其当我们暂时脱离科学理性的藩篱来感受它时，这种亲切感就更加让人热血沸腾、缠绵心头，久久不能挥去。这只是因为乡土往往蕴含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长经验和根植于内心的乡情。如果我们将乡土放大来进行理性分析时会发现，乡土更加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地区的传统，无论这种传统是否优秀，由于是“我们”的而使每一个乡土中的人难以割舍那份浓浓的泥土的芬芳。于是，在培育和教养一代又一代生长于乡土中的孩子时，根植于乡土而产生的乡土教材便成为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了。没有乡土哪里来的家乡，没有乡土哪里来的故土、故乡、地区和国家呢？又哪里来的厚重的传统呢？乡土是每一个人的，乡土是每一个民族的，乡土更是每一个国家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但产生了浓郁的乡土情，而且也有了一份厚重的乡土责任感。这种责任源于对乡土的情感，而对乡土教材的关注则源于乡土文化的厚重。

本书研究的是我国乡土教材的百年嬗变及其文化功能问题，因为乡土教材是我国学校教育乃至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近代开始在我国出现的乡土教材，随着一百多年的历史变迁，已不断发展成为我国教育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且始终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尤其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三十多年里，我国教育随着改革开放政策

的不断深入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进入 21 世纪之后,随着世界教育发展的整体形势,我国教育理论的本土化和国际化发展要求变得极为强烈和迫切,而乡土教材在我国教育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独特的作用。

乡土教材即“在学科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的范围内,结合学校所在地方的实际和特点而编写的教材,如乡土文学、乡土历史、乡土地理等。通常由学校或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组织人员编写,内容主要是本乡本土的地理环境、文物史料、生产状况、文化设施、物产交通、内外贸易以及工农业发展的新成就等。有利于教学紧密联系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树立学生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爱国主义思想”。^①

从某种意义上说,乡土教材的产生和发展是教育发展过程的一种必然,也是各国教育本土化和个性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从广泛意义上来看,我国的乡土教材有几千年的历史,然而,从“乡土教材”的现代教育意义和概念上看,其发展演变则是近百年的事情。我国现代教育意义上的乡土教材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产生于清末民初,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然而,对我国百年乡土教材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历史至今尚未有人进行系统整理。本书依据大量散见的史料,对乡土教材进行系统的梳理分析,把我国百年乡土教材的发端、演变脉络总结为三个时期五次高峰期,并以我国历史演进为线索初步考察分析了乡土教材的文化功能,通过对乡土教材运用现状的大量调查研究,“史现并重”,以历史映射现实,用现实观照历史,以期对我国乡土教材今后的研究和发展能产生一些促进作用。

本书是在笔者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修改而形成的。全书共由七章内容构成:第一章为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

^① 《教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教育大辞典》,第1卷:教育学、课程和各科教学、中小学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乡土教材的意义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主要综述了有关乡土教材的概念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第三章讨论了乡土教材的本土结构、课程结构以及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第四章从理论上阐述并讨论了乡土教材文化功能的涵义与文化功能运行的原理；第五章根据大量史料梳理和总结了我国乡土教材的百年演变过程；第六章讨论分析了我国乡土教材在不同历史时期内文化功能的发挥过程；第七章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对乡土教材发展的现状进行了总结，并通过调查对乡土教材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该项研究的完成，倾注了许多人的心血。我的博士生导师滕星教授为本研究进行了全程指导并亲自为本书作序；本研究的完成还得到中央民族大学“985”二期重点建设项目、香港乐施会的资助；同时，我的同学、师弟、师妹都给予了最大程度的帮助。本研究如果还有点价值，那是因为我是踩在许多巨人的肩膀上进行的，因为在完成本研究的过程中我参考了太多先辈的研究资料，也参考了很多现代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还要感谢那些乡土教材的收集与调查的志愿者，他们出于对自己乡土的热爱，利用寒暑假回到各自的家乡进行了广泛细致的调查，与我一起工作，为我的研究提供材料。

本书的出版，意在解决我国乡土教材建设始终缺乏系统理论的不足，并通过总结经验，满足广大乡土教材研究者的需求，并希望引起有关领导和更多研究者的关注，以期开创现代学校教育与乡土教育相结合的创新研究的新领域。当然，学海无涯，客观来讲，本研究只是个框架性的研究，更细致深入的研究是我未来的主要任务，所以，无论从何意义上来说，不当之处定然不少，本人以真诚的态度期盼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08年10月